

妻子通讯录里有八百多应征男士

“我现在举报我的妻子安×萍,要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避免让更多的人受骗。”10月10日下午,60岁的外地男子阿文(化名)走进南宁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向民警出示了一本厚厚的征婚交友通讯笔录(复印件)后如是说。

这份征婚交友通讯笔录,详细记录了近年来安×萍打出征婚交友广告后,前来应征的800多名各类男子的姓氏、职业和电话号码等情况。其中,这些人轻则被骗到南宁市的一家“定点茶庄”高消费,重则被骗得人财两空。

与朋友相亲者是自己恋人

走南闯北做生意的阿文赚了不少钱,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但因为妻子不忠,最终离婚了。2007年3月13日,他在一则征婚交友小广告上注意到一“44岁高雅气质女士”的征婚信息。当时正在扶绥帮朋友照看生意的他,便给对方打了电话。随后一个星期,当该女子先后换了3个手机号码与阿文3次通话聊天后,阿文应约在南宁市长湖路某酒店的茶室,见到了这名叫安×萍的女子。安×萍身高约1.7米,虽年过40,但看上去气质优雅,风韵犹存。安×萍说自己在南宁开有饮料厂,经济条件不错,阿文有些心动了。随后二人又在那家茶室喝茶聊天,每次都相谈甚欢。后来阿文还为安购买了皮包等价值约2000元的服饰品。2007年4月5日,安×萍给阿文打电话,说她在内蒙古老家的母亲病了,急需用钱治疗,阿文先后三次给安×萍汇钱,每次都是三四千元。2007年4月中旬的一

天,阿文在南宁的朋友姜某在征婚广告上看到了一条关于“气质高雅女”的征婚信息,于是欣然应约。这名征婚女子定的约会地点也是阿文和安×萍约会的那家茶室,阿文便随着朋友一同前往看看。没想到的是,约姜某见面的正是安×萍。阿文拉着她到茶庄的一个角落,质问安为何要骗人。安抹着眼泪说,她的眼睛不久前受过伤,现需要钱治疗,再加上欠债,她是被茶室的人逼迫才这样做的。

由于当时阿文确实看到茶室里有两个人暗暗跟着安,再加上安为了证明自己所说,还电话通知了她的二女儿到茶室解围,说女儿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如今是到南宁看病。阿文心想,安敢带着女儿来征婚,估计所言不假,于是有些同情对方。他对安说:“我给你钱你不用还,你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说完,阿文离开了酒店茶室,回到扶绥县帮朋友打理生意。

婚后发现妻子有问题

阿文向记者出示了一本结婚证说,他与安×萍同居半年后,两人于2008年1月4日在云南省大理市民政局登记结婚。

2008年11月,安×萍说回南宁与朋友合伙开茶庄,但是需要出资10万元,阿文同意了。两人来到了南宁,并租住在南宁市口东村一间民房内。当年11月的一天,阿文在南宁市长湖路的一家银行网点取了10万元交给安×萍。后来,他看到安×萍确实在报纸上打出广告说招收茶庄服务员。

自从交了10万元给妻子安×萍开茶庄后不久的2008年年底,阿文发现妻子经常在用餐时,突然接到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接到电话不久,妻子就打扮出门。

有一次,阿文悄悄跟踪了

安,后发现妻子原来是在长湖路一家雅×茶庄与应婚者见面喝茶聊天。阿文才明白过来,安所谓的招收茶庄服务员,同时在他结婚后仍不断发出匿名征婚广告,实际上是组织了约10名外地女子来南宁从事诈骗活动。她们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以征婚交友为幌子,约南宁及周边一些市县的应征男子,到位于南宁市长湖路的那家雅×茶庄喝高价茶,进而从中获取提成。而其他骗钱的方式还不得而知。

妻子忽然失踪

2008年12月的一天晚上,阿文对妻子表示了愤慨。而安×萍对自己的行为不置可否,夫妻俩为此大吵了一架。两人一番推搡后,阿文当即拨打110报警,但警方认为这是夫妻间的事,当时并没有出警处理。

今年6月初的一天,安×萍回到南宁后,阿文问安×萍去了哪里,安说带着茶庄的陆某等几个服务员去了武鸣、陆川、崇平等地谈项目。阿文问是什么项目,安三缄其口。从妻子的沉默中,阿文猜出了几分,妻子肯定是带着助手四处婚骗去了。“你还是回昆明想一想,这样做(指婚骗)好不好?”今年7月初,阿文将妻子送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妻子,后来他找到昆明市穿金路的他们一直没有退掉的出租房时,发现妻子已经搬走了,不知搬到何处。他打电话给安的大女儿询问安的新住处,对方也是讳莫如深。

后来的电话联系中,安对阿文说是住在昆明市黄土坡亿万小区。今年10月初,当阿文到昆明寻找这个小区时,才发现安给的是假地址。后来,阿文向昆明警方举报了妻子的婚骗行为,但当地民警答复说这些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广西,建议阿文找广西的公安机关报案。

一本通讯录显露婚骗行径

阿文感到身心俱疲。

10月10日上午,回到南宁的阿文约见记者时,出示了安×萍留下的一本记录着800多名应征者信息的原始笔记复印件、她曾用过的3个手机卡、她的好几名婚骗助手的身份证复印件等物,“这些婚骗证据都是安×萍离开南宁前,我从她的皮箱中搜出的”。

记者注意到,安×萍曾用过的这3个手机卡如今都已停机,但里边依然存储了不少这两年来应征者发来的求爱短信,当中还有一些出现了诸如“咬你屁股”等露骨字眼。

这份详细记录了800多名应征者的姓氏、从事的工作、联系电话、籍贯、月收入等信息的征婚交友通讯录(复印件)似乎更能显露出问题。在这份记录上,记着哪些人已经见过,对对方的评价,以及约一些应征者到茶庄喝高价茶后,记录下的收到的茶水费数额。记者注意到,这些应征者从事的行业形形色色,其中既有农民,也有公司经理甚至机关单位在职人员。

记者还发现,在这份征婚交友通讯录上,还有一部分应征者的信息被横线划掉了。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个注明是食品公司职务经理但被划上横线的潘先生,对方称看到征婚广告后,只是在电话中与征婚的女子(安×萍)聊过一次,后来没有见面也没有被骗。有的被划上横线的应征男子通讯信息注明“已见”“不行”“王八蛋,狗屁不是”等字样,还有的被划上横线的注明为部队退役军官、公安等字样。阿文认为,安×萍对一部分人的通讯信息划上横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认为这些应征者没有可榨油水的机会,或者交往起来有风险。

记者在翻阅这本通讯录时简单归纳了一下,发现能引起安×萍重点“关注”的主要

是从从事房地产的人员、公务员、厂商经理,以及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企事业单位中老年男子。在这类男人的身上,通常被注明“经济一般”“很好”“沟通”“条件一般,但很诚实,可以做”等字样。

根据这份通讯录,10月10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被注明为宾阳县某单位的一名应征者斯先生。斯先生回忆说,在今年五六月份,他根据报纸上的征婚交友广告联系到了安×萍,后两人在南宁市长湖路的雅×茶庄见面。他点了一壶普通的茶和一个果碟,茶庄就要求支付400多元。

这份通讯录上的辽宁省抚顺的孙先生的妹妹接了记者的电话,她说上世纪90年代初,她哥哥不知通过何种方式认识了安×萍,之后同居,安×萍把哥哥在抚顺那套价值20多万元的房子卖了后不知所踪。哥哥前几年回到抚顺后,胃病加剧成了癌症,但没有钱治疗,最终于今年3月离世。

不容乐观的举报结果

“现在看来,我是被她的甜言蜜语给迷惑了,进而一步步陷入了她布下的短线和长线婚骗之中。”阿文说,他与安交往结婚两年多来,花在安身上的钱已经将近30万。对这近30万元能否拿回来,他说自己已不抱太大希望。

阿文说,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安居然在与其结婚后还四处行骗,不但自己亲自出马,甚至还召集了一帮年过40岁的外地女子当帮手,“我之所以将此公之于众,一个目的就是提醒更多的人避免上当受骗”。

10月10日,记者多次拨打安×萍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但对方均未接听。记者发短信给安试探她是否还在征婚交友,也没见回复。记者辗转联系起安×萍重点“关注”的主要

已经多年没有回内蒙古老家了,他对姐姐是否在外地涉嫌婚骗并不知情。没说两句,他便挂断了电话。

如今安到底身在何处,她与阿文登记结婚时的身份是真是假?由于安×萍和她的助手“征婚交友”时的一个约会场所——南宁市长湖路的雅×茶庄,属于南宁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辖区,10月10日下午2时许,记者陪同阿文到南湖派出所举报了安某等人涉嫌利用征婚交友进行诈骗的情况。

对于阿文的举报,当天下午,值班民警收取了有关安的应征者通讯录复印件、助手陆某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后,没有对阿文作进一步的询问笔录。

10月10日下午,得知阿文的遭遇和举报妻子涉嫌婚骗后,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有关部门一名负责人希望记者转告阿文,让他根据妻子的征婚交友通讯笔录,打电话动员一些受害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受害者报案后,公安机关就会受理立案,从而尽快打击那些婚骗团伙分子。

而对于其他受害者是否愿意报案,阿文却表示不乐观,他说:“我发了很多短信给那些被骗的人,但是只有3个人回复了短信感谢我的提醒。他们很多人不在南宁,被骗的程度也不一样,也像我一样觉得被骗是件不光彩的事情,难以启齿。但我走到举报妻子的这一步,实在是没有办法。”

“优雅女士”部分征婚广告

女总44 离经济优寻真诚男共生活发展。1325××95607(2008年12月11日、18日、22日、25日)
女45岁经济优气质佳,婚友随缘。1325××8220(2009年2月13日、20日、23日)
女45离高难经商寻气质佳经济条件相当的男士共生活发展。(2009年3月10日)

夫妻俩建公益网站帮助被拐儿童

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在她面前,双手端着一个大铁盆向她伸去。背上紧紧套着一道绳索,绳索的另一头是一架木板车,一个一条腿的青年男子坐在上面唱歌。

这是2009年5月19日上午,呈现在宋婷面前的一幕。

宋婷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福州“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的一员。

宋婷说,小小孩那张悲哀绝望的脸经常在她脑海里闪现。“我感到非常内疚,那个小女孩很有可能是被拐卖,然后被控制乞讨的,当时我应该打电话报警才对。”

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负责人薛健告诉记者,目前福建全省有宋婷这样的志愿者200多名,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发现并搜集流浪乞讨或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并将信息传送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宝贝回家”寻亲网建立的数据库。

“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张宝艳日前向记者介绍,目前在“宝贝回家”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1.4万名,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

仅有的两次妥协

张宝艳的儿子5岁时曾

遭遇过“被拐”,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被拐儿童。

1992年的一天,张宝艳的母亲带孩子去市场,只顾逛市场的张母回头一看,发现孩子不见了。张母赶忙让人帮忙在市场中找,但没有找到。

“当我妈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丢了时,我一下就蒙了,感觉天都要塌了。”张宝艳说。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张宝艳找到了自己的儿子。“深切体会会到丢失孩子的父母焦急、痛苦、绝望等心情”的张宝艳,从此开始留心儿童走失、被拐卖的事情,并为寻子的家长提供帮助。

起初,张宝艳提供的帮助主要是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到处打听被拐儿童的相关信息,帮助张贴寻人启事,或者到派出所报警。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太原始了,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

于是,她开始寻思一个“更快捷、更方便的寻找方式”。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张宝艳发现互联网上有一些专门发布寻人信息的网站。这个发现让张宝艳感到非常惊喜。通过网络将寻人信息都展示出来,通过对比核查,能极大地提高寻找儿童的效率。

但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寻人网站发布信息都要收取费用。“很多家长常年在外奔波寻子,经济已相当困难了,这时候就是让他们掏五六百元也很不容易。”

她和在通辽师范学院网络

技术部门工作的丈夫商量,决定建一个公益性的寻子网站。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诞生了。

刚开始,网站的设想非常简单,只是供被拐儿童的家长将自己孩子的照片、特征描述等信息发布到网上。逐渐地,一些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寻子的家长,主动将在寻子过程中得到的其他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上共享。

后来,一些浏览过“宝贝回家”网站的普通网友开始主动到福利院、街头将被收留、流浪、乞讨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络上。

2008年1月18日,“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在张宝艳的家乡——吉林省通化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张宝艳现在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每天,她早上六七点就会上线,维护网站内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发现需要求助的信息时,她会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她会立即发到全国的各个群中。

张宝艳始终坚持网站的公益性。到目前为止,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共出现过两个商业性链接。张宝艳说,这是她仅有的两次妥协。

“拖车党”“昏睡党”“求助党”

提起志愿者“仔仔”,大多数福建志愿者都会对其竖起大拇指。

“仔仔”是志愿者曹先生

在“宝贝回家”中的网名。“仔仔”是一位曾协助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打掉特大传销团伙的四川小伙子,现在,他是“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8月,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则被拐儿童的线索后,孤身前往漳州协助当地警方解救出这名儿童。当时,他在接受福建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这是我参与解救出来的第41名被拐儿童。”

事实上,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是如“仔仔”那般的“孤胆英雄”,而是像宋婷那样的城市上班族。囿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在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上。

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形形色色,通过长期的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形象划为了三类:

一是“拖车党”:一个小孩子儿拖着一辆板车,车上绑着个大音箱,还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坐在上面唱歌。那大人就是监工,要挟、指令拖车的孩子去要钱。

二是“昏睡党”:在市区的繁华位置,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儿,以此博取路人的同情乞讨。

三是“求助党”:一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小孩子跪在街上,指使小孩子不停地磕头、哭泣乞讨。

况,如家在哪里,小孩的名字、年龄等。

而更多的志愿者,是将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对比,帮助儿童回家。今年9月11日,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小精灵”(应其要求用网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论坛看到“寻儿石小乙”的寻亲信息,该信息显示,石小乙是2005年在北京与家人走散的。

随后,“小精灵”便将该信息转到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QQ群中。当天便有群中的志愿者反映称,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曾在“宝贝回家”论坛中,发过一个在京和家人走散的名叫“张小毅”的孩子的寻亲信息。

“小精灵”一方面动员志愿者从浩如烟海的帖子中找出“张小毅”的帖子,一方面联系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反映情况,并把从该中心拿到的“张小毅”的照片和寻亲帖中“石小乙”的照片传给了“宝贝回家”志愿者信息对比组。对比组反馈的信息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9月14日,“小精灵”辗转与寻亲者取得了联系。“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张小毅’就是我儿子。”为寻子在北京沿街乞讨、睡大街,一度曾攀上北京站前的天桥想了断生命的河南汉子石新旺激动地说。

志愿者行动遭遇困境

在张宝艳看来,让更多被拐儿童回家的坚实基础是志愿

者搜集的信息充分可靠。但信息的充分可靠意味着志愿者在行动中要遭遇更多的危险、误解和指责。

2009年6月,厦门“宝贝回家”志愿者黄佑明和10多位当地志愿者一起在市内搜寻“拖车党”的踪影。他们在跟踪一段时间后发现,每天晚上11点多,会有三轮摩托车将分散于厦门各地的“拖车党”拉到厦门马垵的一处停车场。该停车场停着一大一小两辆安徽牌照的卡车。晚上,控制着10多个小孩儿的“拖车党”就在车厢内休息。凌晨时分,小孩儿又会被三轮摩托车拉到厦门各条繁华的街道上。

跟踪过程时刻面临危险。一天,一名志愿者在石鼓山立交桥附近发现了一辆经常停放在马垵停车场的卡车。当这位志愿者靠上去想掀开车厢后帘时,车内突然跳出几个大汉向这名志愿者逼了过来。

为了便于志愿者沟通,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创建了一个QQ群,但加入这个QQ群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和核查,“我们要保证群里的人都是志愿者,这样我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才不会被泄露。”薛健说,在行动时,志愿者也只是以网名相称。有时还会装扮成情侣、陌生人等对乞讨儿童进行监视跟踪。

除了不可预测的危险,志愿者们还会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遭受别人的误解和指责。

据《中国青年报》